

中国现代民俗学者的月经禁忌研究 *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2)01-0142-06

●李金莲 朱和双

[摘要] 在 20 世纪早期,江绍原是最先引进国外人类学方法系统研究月经礼俗与迷信的拓荒者,他对中国人“天癸观”的研究特别引人注目。正是在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影响下,一大批宗教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医学家先后讨论过与妇女月经禁忌有关的话题。这些研究旨在说明,月经现象虽然常见,但由于人们缺乏这方面的科学知识,因此在月经的性质、功用和意义方面产生了诸多迷信的说法。

[关键词] 现代中国;民俗学者;月经禁忌;研究范式;社会影响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五四运动以后,在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民俗学者开始了科学研究月经迷信问题的尝试。在这一方面,江绍原独辟蹊径,其开创的中国人“天癸观”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后,一大批人文学者也曾涉足这一领域并留下了各自探索的足迹。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早期民俗学者关注月经迷信方面的问题,明显地受到了《金枝》(The Golden Bough)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月经迷信问题的探讨并不是单纯地为了研究而研究,更不是钻进去做研究对象的奴隶,而是有着明确的为社会文明进步服务的功利目的。

一、月经礼俗与迷信研究的开拓者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江绍原开始把研究重心转移到民俗学并广泛征求民间与天癸(月经)有关的迷信。

* 本文属云南省“两院”立项课题“人类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妇女月经期护理行为研究”和楚雄师范学院科研骨干项目“女性、污秽与象征:泛文化视野中的月经禁忌与女性民俗研究”的成果之一。

西北民族研究

N. 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2 年第 1 期(总第 72 期)

2012.No.1(Total No.72)

从1926年3月8日起,江绍原研究月经迷信的最初成果《中国人的天癸观的几方面》在《晨报副刊》上分四次连载。他在文中写道:“这次我又要借《晨报副刊》的篇幅,来报告另一种更奇特、更荒诞、更可晒——而且也更饶兴趣——的思想:中国人的天癸观。”关于月经迷信的研究,的确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江绍原指出:“我国人历来对于这件赤色的物事,说也有趣,又是分为友敌两派的:有些人把它看作最可怕的污秽,极力的躲避它;又有些人却许为至宝,靠它奏种种奇功,连打倒帝国主义和成仙都在内!”总结起来看,江绍原对中国人的天癸观解释为以下几点:第一,天癸是一种污秽之物,与疾病、生产、性交及死尸类似;第二,天癸具有使鬼魅和邪术家都畏惧的污秽力量;第三,经血与经衣能解毒治病,例如两性病、急病、受毒等;第四,天癸(特别是第一次的天癸)被视为人身的一种精华,与乳汁、大小便等相同,可与其他“人元”及天地精华合制成丸散丹膏(红铅)而服用,小到壮阳补血,大至益寿延年。可见,经血不仅有药的成效,亦是方术家用以辟邪的利器。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更有说服力,江绍原先就他所知道的情况把几种本非中国而曾传入中国的天癸观,进行了梳理,专门把“犹太教”(基督教)、“回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典籍中有关妇女月经迷信的论述作了归纳,认为:“非中国的天癸不净观影响过中国人”,但是“我国和以上三宗教发生关系之前,自有相类似的思想,而且中国的天癸观,在某一部分人中,后来发展成了与原始的不净观相违反之新观念。”^①

江绍原对于中国人的天癸观的基本研究范式是查阅古代文献和到民间去搜集资料,他说:“中国本土的天癸观,有两个研究途径是一般重要的:第一,从种种书籍里去搜集过去时代的事实;第二,从社会调查现存的民俗。”而“这两种相辅而行的工作,我都没好好做过。今番不过是把两月来独力搜集所得的一点点材料写下,做将来详尽研究的开端而已。借《晨报副刊》的地位发表出来,或者又能够引起旁人的兴趣,并且使我得到我很需要的种种帮助。”^②的确,江绍原说的是大实话。他虽然在月经迷信研究方面有首创之功,也努力地“从种种书籍里去搜集过去时代的事实”,但用“两月来独力搜集”显然会挂一漏万,况且“从社会调查现存的民俗”这一方面则主要依赖于他的夫人朱玉珂女士。江绍原写道:“关于上次所说的妇女在行经期内有许多事不许参与或者看见,今天吾妻供给我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总结了禁止经期妇女出现的五种场合,即蚕室、腌冬腌菜或做酱、折或烧纸钱、泡豆芽菜、小儿出痘疹。^③所谓“到民间去搜集资料”,多是采用通信来完成的。“我在北京时,一位通信者告诉我一个治花柳病的秘方,其中主要‘药物’,是妓女的月经。刻在著作中之《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一书,可将该信采入。”^④江绍原对于读者寄来的材料,很谨慎地对待,查阅文献,尽量寻找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的起源和起因。

在杭州漂泊的日子,江绍原计划写作《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一书,拟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我正在整理几篇旧稿,想把它们增订一下并贯穿起来成为一本小书,名《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1928年4月11日,江绍原在杭州写成了该书的导言部分寄《贡献》(旬刊)发表。在杭州下板儿巷十五号“闲居”的江绍原写作《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的道路并不顺畅。1928年1月24日,他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血与天癸’不瞒您老人家说在修改,进行颇慢,非我懒也,常发见(现)困难点也。”这一时期,江绍原在月经迷信的研究上并没有什么重大发现,可能与资料匮乏有些关系。他大概只是到杭州浙江图书馆分馆去看一看,收获并不大,只能看到“纽约一个书店编印的新书目录”。他在《〈血与天癸〉导言》中说:“如有错误,印书前自当修改。”“以上杂抄若干种书籍杂志而拼凑成的几千字,断章取义,就易避难,既芜杂,又凌乱,诚不足以当介绍科学智识之名。”^⑤从内容上看,导言大量列举了自然科学界关于月经的新学说与新发现,与迷信研究关系不大,同时还辑录了英国赫勃脱(Mrs. S. Herbert)夫人著的《性的故事》(Sex Love)中有关月经迷信的内容。此外,他也注意到俄国民族学者史禄国关于满族月经迷信的研究内容,并作了摘译。本来,江绍原在月

① 江绍原.中国人的天癸观的几方面(一)[N].晨报副刊,1926-03-08.

② 江绍原.中国人的天癸观的几方面(续)[N].晨报副刊,1926-03-10.

③ 江绍原.中国人的天癸观的几方面(续)[N].晨报副刊,1926-03-13.

④ 亚介、招勉之、周作人、江绍原.七十岛的宗教行为及其他[J].新女性,1928(6):36.

⑤ 江绍原.《血与天癸》导言[J].贡献,1928(7):5,19.

经迷信研究方面曾有过很大的抱负,成书之前就利用文化界的朋友造舆论。1928年4月7日,钱玄同在致江绍原的信中提到:“岂明说,你以前来信要我写《血与天癸》之封面,兹附上,乞察收。如已不及用,请把它扔在它应该去的地方可也。”^①1928年7月4日,江绍原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血与天癸第二章,不久便可寄贡献发表。先生如高兴,请题几个字,文为‘古代的衅礼’。第一章本托伏园转恳鲁迅先生一题,不知是他没去还是去过而未生效。第三章(‘血祭’)预备请沈尹默先生给写,您猜他会答应吗?末章讲月经,非找个女士题字不可。”按照计划,“末章”还要讲到月经,但这一部分始终没有完成。1929年3月8日,江绍原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血与天癸》至今未改完。”^②1930年5月11日,江绍原致信周作人说:“开明有信来催‘血与天癸’,但非等到暑假实无以应也。”^③

不可否认,跻身“苦雨斋四大弟子”的江绍原,与周作人的学术交流对其月经迷信的研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据说江绍原第一次看到的弗雷泽《金枝》的节选本,就是从周作人那里借的。^④五四以后,周作人感兴趣的工作只是“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他非常关心江绍原对月经迷信问题的研究。1928年1月13日,他在致江绍原的信中说:“‘血与天癸’不知何时付印,不佞亦颇有意给他戴一顶小‘冠’,倘若不即要,疑古公之题字则已转告了。”^⑤信中提到的“给他戴一顶小‘冠’”,是指周作人有意为拟出单行本的《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写篇序文。而“疑古公之题字”是指钱玄同为拟出单行本的《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一书的题签,后来《贡献》刊发《〈血与天癸〉导言》时,篇头用的就是钱玄同的题字。1928年2月13日,周作人在写给俞平伯的信中说:“因绍原要出第二册书《血与天癸》,我曾答应给它戴一顶小帽子也。礼拜四下午可以请来谈天,我当比兄早一点钟下课,可早进城,在苦雨斋奉候也。”^⑥周作人约俞平伯来一起磋商为江绍原关于民俗研究的系列论文集《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作序的事,其关切之情溢于言表,甚至还亲自动手为江绍原查找月经迷信方面的资料。1928年3月2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的信中说:“今日偶阅日本田中祐吉所著(去年出版)‘变态风俗之研究’,其中有‘月经俗称考’一文,其中或有足供参考的地方,今摘抄如别纸,祈察入,匆匆不一。”^⑦后来,江绍原将该译文照样录入《〈血与天癸〉导言》之中。

二、其他民俗学者的月经禁忌研究

黄石(原名黄华节)在月经禁忌研究方面的特点是既注重利用文献资料作比较,也注意尽量使用现代人类学方法对中国本土相关的民俗展开调查。在《性的“他不”》一文中,黄石专列了“月经的妇女”、“初成年的少女”两部分讨论妇女月经禁忌方面的内容。按照黄石自己的说法,该文是1928年5月22日草于广州协和大学图书馆,他在文中提到:“听说江绍原先生不久就有一本《血与天癸》在开明出版,我相信里面一定搜集不少的材料,供我们研究。我打算把这种工作让给他,此刻只略举一两个例,聊以充数而已。”^⑧当然,“充数”只是黄石谦虚的说法,相比较而言,他的研究比江绍原更为大胆。江绍原使用“天癸”做题目,也让人嗅到了些许“保守”的味道,而黄石的研究直接使用“月经”一词,似乎更少些不必要的顾忌。黄石对月经禁忌的研究更侧重于译介国外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将它和中国的资料作比较,寻找不同文化中的共性。在《性的“他不”》

① 钱玄同.钱玄同致江绍原信[J].鲁迅研究月刊,1998(1):56.

② 张挺、江小蕙.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390.

③ 张挺、江小蕙.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407.

④ 孙郁.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1.

⑤ 张挺、江小蕙.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50.

⑥ 商金林.诗人·红学家·教授——俞平伯[A].萧超然主编.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49.

⑦ 张挺、江小蕙.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58.

⑧ 黄石.性的“他不”[J].新女性,1928(7):763.

一文中有关月经禁忌的资料,绝大部分“取材于弗来泽的《金枝》,余外参考《宗教伦理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和耶芳斯的《宗教史概论》”,而且从注释部分来看,他引用的《金枝》英文书还是1927年刚出的新版本,这在同时代的民俗学者中是不多见的。黄石关于月经禁忌问题的研究,大量举出野蛮民族或半开化人之中不成文的月经禁律。至于写在典册上的有关月经的戒律,则举出了世界各地的古老条文做例子来说明,并把它与在中国文献及现实习俗中发现的类似例子相比较,最后总起来加以解释。在《关于性的迷信与风俗》(一)中,黄石专门谈到了文明社会对于行经妇女的禁制问题。^①在《关于性的迷信与风俗》(二)中,黄石又补充了很多月经迷信的资料,还写到了“两种颇通行的(月经)迷信”,第一种是民间说的“撞红”,即指男女性交时忽值妇女月潮来涨,第二种是月经可治白浊的怪方。“妇女月经的法力”这一部分所讨论的月经迷信材料,则是黄石亲自收集来的。他调查了广东民间婚俗中的“上轿红”、“入门红”、“坐床红”等风俗,照例列举了其他民族有关“月经的法力”的资料和部落女子“遵照血的‘他不’”的种种迷信做法作比较。^②

20世纪30年代,医药民俗学者祝枕江编著的《处女及其他》(1931)收录有《月经奇观》一文,他论述了规避月经妇女这种迷信,认为:“经血腥秽,……所以对于经期中的妇女施行隔离,与卫生上裨益不浅,而且在这时期中有了别居的习惯,可免男子滥行性交,这于女子的身体上也很有益处。……对于临经的妇女认为不洁之身,严行隔绝,这是出于宗教的迷信,并无别种深意含蓄在内。……要之隔离经期中的妇女,不问是否出于迷信,其目的不外谋清洁就是了。”^③很明显,祝枕江是用现代社会的理性思维来说明妇女行经时要独居的原因是谋清洁,这种认识显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位关注月经迷信问题的医药民俗学者是王君纲,他编著有《月经的传说和迷信》(1933)、《月经的传说》(1935)等著作。王君纲在《月经的传说和迷信》一书中,详细探讨了“古时对月经的迷信”、“行经妇人的不洁和禁忌”问题,认为经血之被古人视为神秘物,“也许是因了月经的血,有特殊的气味缘故吧!”^④王君纲注意到了中国流行的月经妇女不可性交的迷信思想,并从自己身边熟悉的环境入手,对苏州传统婚俗中月经禁忌的问题作了一番调查。王君纲还注意到苏州一带有着此等“迷信”的信念:“另一方面,即关于临嫁时行经的情形,凡新嫁娘在结婚时,适有月经,乾宅以后必蒙不利。所以凡新嫁娘,这是必设法用种种酸性液,来阻止月经的责临,倘使不能,在结婚时,伴娘必须于新娘出花轿时,需要叫喊着‘新小姐是骑马来的’来破除这不祥。这迷信盛行于苏州一带,因月经带,每俗称为骑马布。”^⑤

朱云影编写的《人类性生活史》(1936)专门有一节讲述原始族群关于妇女月经的迷信问题。原始人“觉得月经简直是不可解的谜,因为不可解,所以认为危险不吉利,他们从月经联想到恶魔,以为经血是恶魔惹起的,其中藏着种种的毒害。”为了论述原始族群对月经禁忌的态度,朱云影搜集了世界各地土著人的资料加以说明,这些族群都认为月经期间的女子为不洁的危险物,必须设置一定的距离加以防范,令经期妇女服一定的禁律,或幽闭于特别的秘密室或人迹不到的深山,杜绝其与他人来往。关于“月经小屋”这种普世性的风俗,他也收集了原始族群隔离月经期女子的资料来给予说明。为了进一步强调这种隔离风俗的普遍性,他还提供了文明社会里的月经禁忌资料。与此同时,朱云影还论述了原始族群有关月经的另一种迷信做法——月经巫术。他举出了大量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将古人关于月经的原因的解释略加以叙述”,书中列举出了有关妇女为什么每月都会来月经的民间传说,同时也归纳了希腊医学对月经的看法,并提供了西方学者有关月经起源的说法供读者参考。^⑥从所列参考文献来看,朱云影主要依赖的是外文资料,他所列日文参考书是英文参考书的两倍多,有些参考书用的还是日译本。值得注意的是,朱云影并没有提到弗雷泽的《金枝》,这刚好和其他的研究者对《金枝》中有关的月经禁忌资料的重复引用有明显的差异。应该说由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朱云影收集的月经禁忌资

① 黄石.关于性的迷信与风俗(一)[J].新女性,1928(10):1178.

② 黄石.关于性的迷信与风俗(二)[J].北新,1930(11):54.

③ 祝枕江.处女及其他[M].上海:开明书店,1931.154~155.

④ 王君纲.月经的传说和迷信[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13.

⑤ 王君纲.月经的传说和迷信[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41.

⑥ 朱云影.人类性生活史[M].南京:正中书局,1936.8~15.

料对普通读者来说都是全新的 更加具有说服力 稍有不足的是他始终忽视中国方面的资料。

1937年 著名医学史研究者萧叔轩发表了《民俗的医药 ——月经妇女之性的禁忌》一文。他从中国古代医学文献研究入手 讨论了妇女月经期间避免性交的禁忌及其产生的原因。除了参考同时代人关于月经迷信的论述外 萧叔轩还参考了大量的外文资料 包括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和宗教学者耶芬司(F. Byron Jevons)的著作 也引用了《旧约》之《创世记》、《利未记》中关于月经禁忌的大量内容。萧叔轩的这篇文章在综合前人研究观点的基础上 集中讨论了“月经期中的‘搭布’(Taboo)”、“妇女月经期间同房的祸害”、“妇女行经时禁绝房事的规条”等月经迷信问题。萧叔轩大量查阅了中国古代的医学文献如《黄帝内经》、《巢氏病原》、《千金要方》、《保元护命方》、《本草纲目》、《医宗金鉴》等论著中有关妇女月经的资料 并结合一些野史笔记 详细考证了中国古代妇女月经期间禁绝房事的各种有趣做法 甚至对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的月经隐语也进行了详细的考释 颇见功力。^①

三、月经禁忌研究产生的社会影响

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初创时期研究月经禁忌的人 多少是有过留洋经历的 像周作人、江绍原、朱云影等均属于这类人。而黄石、王君纲等人可能并没有真正的留学经历 而是当时中国的教会大学培养的学生。黄石曾到过暹罗(泰国) 后来又在广州白鹤洞协和神科大学跟随校长龚约翰(Dr. John S. Kunkle)博士研究宗教史 据说还在燕京大学讲过课 而王君纲更是圣约翰大学培养的医学博士。他们的共同点是外语方面的造诣非常高 所以和国外学术界之间没有障碍。研究月经迷信的这批人当时所接受的学术思想 大致可以说是很西化的。由于受当时盛行的人类学思潮的影响 他们的治学非从形而上入手探究学理 而是植根于民众生活的细处讨论问题。虽然他们在月经禁忌研究方面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比如说有着良好的外语基础 对人类学资料和方法的利用等) 有时甚至在资料的选用上还有一些重复的地方(比如对《金枝》、《旧约·利未记》和普林尼的《博物志》等著述的引用) 但总体来说都能够发挥各自的专长 因而在学术研究上得到差序互补的机会。相比较而言 在月经迷信研究方面 江绍原的影响似乎要更大一些 这可能与他那夭折的《血与天癸 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名声太大颇有些关系。江绍原发表的月经迷信研究论文 从时间上来说要早一些。当时的文化界对《血与天癸 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一书的期望值过高 是否也是其夭折的原因?尽管王君纲后来也出版了月经迷信研究的专著 但其学术地位并不高。黄石、朱云影等人更多地是做了些翻译的工作 他们对月经禁忌问题的论述给人的感觉似乎总是支离破碎、拼凑的。后来的王君纲、萧叔轩从事的月经禁忌研究 同样也给今天的学术界留下了相当范围的拓展空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由江绍原等人开启的月经礼俗与迷信研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可否认 当时处于民俗学运动中心的江绍原 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研究月经迷信问题的“合法性” 他和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交往对他的学术声誉似乎也有些影响。鲁迅先生也很赞同江绍原关于写作《血与天癸 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的计划 在他看来 江绍原立足于人类学思路对中国乡土习俗的研究对于认识吾国吾民意义甚大。鲁迅在1927年11月20日写给江绍原的信中说:“关于要编的两种书的计划 我实在并无意见。《血与天癸》……我想 大抵有些人看看的……偌大的中国 即使一月出几本关于宗教学的 那里算多呢。”^②江绍原自己回忆说:“后来 我计划编写《血与天癸》、《二十世纪之宗教研究》两本书 鲁迅先生认为前者作为民俗学的一种著作抑或有人看看 后者因为这种理论不合时宜 是不会有人关心的。”^③鲁迅对当时宗教研究的冷落局面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发出慨叹 所以当江绍原因拟撰写《血与天癸 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而征求他意见的时候 就有了上面的通信。鲁迅认为人血馒头治病的迷信正与“毛发爪甲可以补血”一样野蛮 所以他赞赏江绍原写《血与天癸 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在鲁迅看来 江绍原对中国原始禁忌及迷信的人类学、民俗学研究对于启发及观察“中国社会状态及心理方面”是大有益处的。

① 萧叔轩.民俗的医药 ——月经妇女之性的禁忌[J].中西医结合,1937(2):113~151.

② 魏韶华.中国现代文学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26.

③ 潘德延.走访江绍原同志[A].湖南人民出版社编.鲁迅研究文丛(一)[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15.



令人遗憾的是,江绍原后来放弃了继续研究月经迷信的工作,他的《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一书原来拟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结果不了了之,以致今天的读者难窥其月经迷信研究的全貌。尽管如此,江绍原在月经迷信研究方面的大胆开拓,时人还是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928年3月,钟敬文在《数年来民俗学工作的小结账》中说:“江先生的工作,也是数年来中国民俗学垦荒期程中一个非常可纪念的!三数年来,江先生在北京、上海各种杂志、小报上所发表的‘小品’,想大家都已见过,闻说现在已把那些民俗学的好材料,汇印成两册集子,名《发、须、爪》及《血与天癸》。江君的工作,虽只在采集和整理材料上,而研究的结果尚未多见到,但这是此刻中国学术界必然的现象,因为材料尚未得到或整理过,谈到研究,乃是荒唐的事。”^①叶德均在1931年4月25日《草野》5卷3号发表之《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过去及现在》一文中说,江绍原“专研究礼俗迷信的影响很大,……根据《礼部文件》两篇底稿写了《发须爪》及《血与天癸》的两部大著。”^②江绍原的月经迷信研究揭示了原始民风“假知识”、“糊涂心思”对人的思维的影响,那也是迷信产生的原由之一。

在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中,以宗教学与人类学相交叉对月经禁忌问题作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著名作家曹聚仁将是否存在月经禁忌视为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在《无题》一文中指出:“月经,目可得见,口不可得言,笔更不可得而写,其势然也。摩登仕女高跟托托,旗袍飘飘,应声能作狐步之舞。然谈及月经,未有不面红耳赤者,其观念与烧纸锭被不祥的车夫并无分别。”在中国不成文的普遍信条里,月经属于不祥秽物之类。曹聚仁谈到了中国人关于月经禁忌的种种情状:“月经既行,秤、尺、斗等应用物品绝对不许女人跨过,某车夫因为车垫给女客污染了,洗涤以后,再烧串纸锭以被不祥。”月经的污血会随处传播不祥。曹聚仁还注意到:“破红衣袍的唯一妙物,就是女人的月经布,满城高挂,炮弹不飞,炮身自裂,相传效验如神。”“月经又可以避雷,……取秽布盖头,雷不敢击。”此外,曹聚仁还写到有关月经起源的荒诞传说:“我们的老祖宗在洞里住的时候,夜黑风大,躲着不敢出来。遇到天晴月圆,才出洞舒散舒散。久而久之,影响到女人的月经,跟着月亮的圆缺,非每月行一次不可。”曹聚仁对当时中国社会仍存在的月经禁忌表示不满,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妇女运动喊得振天价响,丝毫没有效果,人不解其故。……只要看月经仍保持神秘的意义,即不到城隍庙看密司拜菩萨,已可断定妇女运动的命运了!”^③

在江绍原等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及月经禁忌方面的话题,相关的著述不断出现。1934年,方纪生在其编著的大学教本《民俗学概论》中专门写到“民间医药”中的月经迷信:“土耳其及德国以经血治相思病,印度以经血壮阳,希腊人以经血为媚药。”^④此外,还有林孟愉的《月经之话》(1933)、郭涛的《羞坏了兰英——月经的故事》(1942)、萧叔讷的《月经的迷信》(1946)等。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破除月经迷信的思潮。中国现代民俗学者从学术的角度对月经迷信作研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仍然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由此开辟了一个前人较少问津、直到今天研究也相当薄弱的女性民俗领域。我们知道,在现代民俗学初创时期,许多传统的卫道士对研究月经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是嗤之以鼻的。如果谁亲自调查月经方面的习俗,极有可能遭到人们的讥笑,说这是猎奇或者耽于不经,更被某些人视为诲淫诲盗。从中国现代民俗学者的研究论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研究动机绝对是学术性的,是很严肃的,看不出丝毫猎奇猎艳的痕迹。尽管他们的研究还比较初步,较多历史的探索,也难以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但他们的这些工作无疑启示后人在民俗学这个领域内,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开垦这块处女地。(本文英文摘要见P.188)

[收稿日期]2010-07-13

[作者简介]李金莲(1975~),女,楚雄师范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楚雄 675000
朱和双(1976~),男,民族学博士,楚雄师范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楚雄 675000

① 钟敬文:《数年来民俗学工作的小结账》[A]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23。

② 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M]。成都:巴蜀书社,1995:315。

③ 曹聚仁:《无题》[N]。申报·自由谈,1933-06-04。

④ 方纪生:《民俗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内部修改、重印),1980:43。

难有收成的瘠壤。孤绝的境地与马林诺夫斯基孤独的影子形影相吊 这也是我们孤独地拥抱马林诺夫斯基、热爱马林诺夫斯基的缘起。

[收稿日期]2011-09-12

[作者简介]马丹丹(1979~) ,女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上海 200444

The Dialectics of Malinowski

Ma Dandan

Abstract: One of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anthropology as an intellectual discipline is whether it belongs to science or humanistics. The split personality had tormented Malinowski expressed in his ethnography and field diary has affected Levi-Strauss and Clifford Geertz, at the same time, his contradictory attitudes toward sex freedom of the Melanesians has also influenced the idea of Margaret Mead such as fables of rapport. However, it is the incompatible contexts created by this anthropological master that exposed his inward nature of middle class in regard to the conception of civility and habit of self-control.

Key words: science, humanistics, culture pressure, middle class

Bazaar, Invisible Time and Uyghur's Cultural Psychology

Wang Min

Abstract: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ree types of invisible time-set on Uyghur's Bazaar by summing up the time-set on Bazaar, and then analyzes the history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se three kinds of time-se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nvisible time-set on Bazaar is not only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daily life of Uyghur, but also has its own system of customs, controls, and multiplicity, which could be studied to reveal the Uyghur's concept of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In a word, Uyghur's Bazaar has become a symbol of Uighur identity by means of cultural patterns it shows behind the invisible time-set.

Key words: Bazaar; time-set; the Uyghur(See P.134)

An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n Taboos about Menstrual Cycle in Modern Folklore Studies in China

Li Jinlian Zhu Heshua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iang Shaoyuan, who has been influenced by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trends in Europe and the U.S.A,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religious customs and menstruation folklore. Jus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ampaign of modern Chinese folklore, many religious scholars, historians, writers and medical scientists had joined the discussions about social taboos on women's menstruation. They found that although menstruation is a usual phenomenon, there are many superstitious ideas about its' nature, function and meanings because of people's poor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modern China; folklore researchers; menstruation taboos; research paradigm; social impact(See P.142)

Contemporary Value of Folk Culture

Cai Zhirong

Abstract: As a traditional cultural phenomenon, folk culture's contemporary value is becoming prominent and is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Folk culture manifeste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in cultural, economic, social and other fields. At the cultural level, folk culture is the source and foundation of ethnic culture, modern culture as well as advanced culture. It has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economic field, folk culture has acted as a subsystem of larger cultures, it has also become a kind of intangible capital that is producing economic benefits. In the areas of social life, folk culture's function of maintenance, unity and enlightenment can not be replaced.

Key words: folk cultur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enlightenment(See P.208)